

王韬、容闳的个人经历与近代 西学东渐中知识分子的境遇

袁 蓉

1828年11月10日（清道光八年十月初四日），在苏州东南约50华里的江苏甫里（今苏州甪直镇）一位塾师家中，一个男婴呱呱坠地。7天后，与澳门一水之隔的广东香山南屏村（今珠海南屏镇）一个贫苦农民家中，也添了一个男孩。这两个孩子虽然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人生经历，日后却同样成为近代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的风云人物——王韬与容闳。他们都曾与太平天国有过瓜葛，都曾为洋务运动推波助澜，都曾与维新人物过从甚密；他们怀着对民族国家的拳拳之忧，对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对新闻事业的促动，对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推进等都作出了突出贡献。本文试从他们曲折坎坷而又多姿多彩的个人经历，透视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下知识分子的境遇。

一 中学传统与西学背景

王韬，初名利宾，后易名王瀚、王韬。王氏祖籍昆山，明代时为巨族，“族中多有位于朝”。但经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兵入关的兵燹战乱，“阖门殉国难”，只有始祖必宪因“甫在垂髫”而幸免于难，家道亦从此中落，此后数代读书习儒，为书香世家。其父王昌桂，工诗善文，学识渊博，“邃于经学”，9岁时即能将“十三经”背诵如流，有神童之誉。其母知书达理，家教甚严。王韬天资聪颖，他“少承庭训”，9岁起就“毕读群经，旁涉诸史”。他也曾试图通过科举正途“为天下画奇计，成不世功”。18岁时参加

县试，考中秀才。主考官江苏学政张芾对其大为欣赏，称其“文有奇气”^①，拔冠邑痒，进入县学。然而，在次年的乡试中他却受挫而归，从此对科举失去信心与兴趣，不再作举业之想。

1847年，其父前往上海设馆授徒，两年后突然病故。“既孤，家益落”。^②为养家糊口，王韬应英人麦都思之邀，在上海《字林西报》附设的墨海书馆担任中文编辑，前后达13年。这一“卖身事夷”的举动在当时为人们所鄙视和耻笑。尽管王韬起初并非心甘情愿地为洋人服务，但正是在上海的这段经历，改变了这位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轨迹。墨海书馆是1843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麦都思在上海创办的专门印刷和出版书籍的机构。当时的上海华洋杂处、西风渐盛，是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焦点所在，也是在华西方人士活动的中心和西学传播中心。而墨海书馆又是西人云集之处，他在这里参与了《圣经》、《格致西学提纲》、《重学浅说》、《西国天学源流》等书籍的翻译，得以结识伟烈亚力、艾约瑟、慕维廉等一批西方传教士，又与著名学者李善兰、蒋敦复等有着密切交往。通过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王韬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发生很大变化。

与王韬相比，容闳则完全是一个西学熏陶下的新式学子。他7岁入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夫人所办的教会学堂读书，13岁又入马礼逊学校。从1847年起随美国传教士勃朗赴美留学。1850年考入著名的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在美学习期间，“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③。他满怀报国之志，自感责任重大，“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④。在美留学的8年时间里，他得以广泛而系统地涉猎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耳濡目染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希望“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⑤。他试图通过兴办教育的方式，将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介绍到中国来，提高民众素质，改革弊政，摒除陋俗，使古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382~386页。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382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88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89页。

⑤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149页。

老的中国跻身世界近代化先进国家之列。终其一生，容闳为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他自幼接受西方近代教育，但其中学根底的缺乏也使他在实施教育计划的过程中遭遇重重困境与种种尴尬。在回国的船上，他发现自己竟不能用汉语翻译“暗礁及沙滩”，“自念以中国人而不能作中国语，亦无词以自解也”。^①经过近半年的补习，终能重操粤语。虽然他在留美之前学过4年汉文，“根基之浅，自不待言”^②，甚至其生平自传即后来著名的《西学东渐记》也只能用英文写成。

二 与太平天国的瓜葛

1851年太平天国在广西揭竿而起，然后一路东进，直取金陵，并于1853年3月19日定都于此，改名天京，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10余年的政权。

1855年容闳回国后，为谋生之路四处奔波。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翻译处和英商宝顺洋行任职，并一度以经商为业。就在容闳归国的那年夏天，他在广东亲眼目睹了一场血淋淋的大屠杀：“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盖以杀戮过众，不及掩埋。……索任其暴露于烈日下也。……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已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赭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空气中毒菌之弥漫，殆不可以言语形容”^③。两广总督叶名琛对粤中会党起义的这场血腥镇压，使7万多人惨遭屠杀，其中多半是无辜冤死之人。这使得容闳的同情心完全转向了太平天国。1860年，他到天京与干王洪仁玕会晤，并向洪仁玕提出7条建议：“一、依正当之军事制度，组织一良好军队；二、设立武备学校，以养成多数有学识军官；三、建设海军学校；四、建设善良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之人才，为各部行政顾问；五、创立银行制度，及厘定度量衡标准；六、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耶稣教圣经列为主课；七、设立各种实业学校。”容闳还与洪仁玕就这7条建议逐条讨论，并提出“倘不以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92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94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95页。

为迂缓，而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①。在这7条建议中，与教育直接有关的就有4条之多。遗憾的是，几天后洪仁玕派人送去一枚刻有“义”字封爵的印章，让容闳大惑不解，加上容闳认为所见的太平军领袖“行为品格与所筹划，实未敢信其必成”^②，于是谢绝了太平天国的赐封，怅然回沪。

此时的太平天国刚从天京事变的打击中稍稍恢复元气，1860年6月李秀成率领太平军占领了王韬的家乡苏州，苏南大片地区也被纳入太平天国版图。上海城里挤满了逃亡的难民，其中还有不少官员和乡绅。“沪上繁华远逾昔日。诸名士避地至此，来作寓公，赌酒论诗，几忘兵燹”^③。王韬虽绝意仕进，却始终未曾放弃个人抱负，面对国家多灾多难、积贫积弱的现状，1860年夏秋间，他多次上书当时的署理江苏布政使吴煦，提供太平军情报，“代画方略”，却由于“言过切直”而触怒当局，“用其言而仍弃其人”，令王韬“扼腕叹息痛哭流涕”。^④

从王韬上吴煦的禀文中可以看出，他为镇压太平天国出谋划策，可谓用尽心思。同当时许多传统知识分子一样，他也是不屑于与太平军为伍的。1862年元月，王韬因母亲病重而返乡。这时，又一次改变他命运的事件发生了：这年4月，一个署名黄畹、字兰卿的苏州儒生给太平天国苏州长官刘肇钧写了一封长信，为太平军献计。信中强调在上海的外国人的军事力量强大，建议太平军避开锋芒，暂时集中力量进攻清军，尽可能与外国人维持亲善关系。但这封信却落入清军之手。清廷要求迅速查拿黄畹。不久，上海当局认定：黄畹即为王韬。王韬因此受到通缉。他先是潜入墨海书馆躲藏，后又被接到上海英国领事馆避难。清廷多次引渡不成。同年10月，王韬又乘英国邮轮“航海至粤，旅居香海”^⑤，从此开始了长达23年的流亡生活。

三 直面西方与理想的付诸实践

王韬抵达香港后，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中国的《四书》《五经》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119～120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第120页。

③ 《瀛寰杂记》，岳麓书社，1988，第190～191页。

④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383页。

⑤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383页。

译成英文。王韬自幼熟谙儒家经典，经过其修改润色的译文行文华美，辞意通达。理雅各也给予王韬很高评价。这套名为《中国经典》的丛书出版已一百余年，至今仍被世界各地的汉学家视为标准本。当时的香港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西人云集，西风极盛。1867年，王韬应理雅各邀请赴欧洲。尽管此前王韬曾在上海、香港广泛接触过西方近代文化，但此次欧洲之行对他来说仍有破天荒的意义，使他得以“遍游域外诸国，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强弱”。^① 旅欧期间，王韬两游伦敦，三访爱丁堡，两经法国。19世纪中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②。当时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由于环境和条件所限，他们对西方事物的了解只能是雾里看花。而王韬以自由民身份对欧洲进行实地考察，身临其境，因而有可能克服其前辈甚至同时代思想家们对西方事物的道听途说和闭门造车的缺陷，“余之至泰西也，不啻为先路之导，捷足之登，无论学士大夫无有至者，即文人胜流亦复绝迹。”^③ 对西方社会有着更为直观全面的认识，对“其兵机之利钝、器械之优拙、疆域之险要、了然如指诸掌”^④。回到香港后，王韬网罗搜集欧洲史事，编撰西欧史著，对其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做了精辟分析，较深刻地触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方方面面，对西方近代政治制度的给予了极大关注，思想出现很大飞跃。1874年2月4日，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抨击时弊，鼓吹变法图强，成为著名的改良主义思想家。

正当王韬流亡海外、游历西欧之际，容闳经友人介绍成为曾国藩幕僚，开始将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付诸实践。为博曾国藩好感，容闳不辞辛苦，远赴美国，为曾国藩采办机器，为建立江南制造局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深得曾氏赏识。他又建议在江南制造局内设兵工学校，培养机器制造方面的人才，更得曾氏嘉许。1868年，容闳向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自己的教育计划，由其转呈总理衙门上奏。该计划以设立轮船公司、开矿筑铁路、限制教会权力为陪衬，着力提出选派优秀青年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第384页。

② 《漫游随录图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第82页。

③ 《漫游随录图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第2页。

④ 《瓮牖余谈》，岳麓书社，1988，第3页。

此计划得到曾国藩的首肯，并立即与李鸿章往返函商，指派翰林出身的陈兰彬与容闳一起草拟实施方案。经曾李二人会衔上奏，1872年5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奕訢等人奉旨复议，由清政府正式批准实行。

1874年，容闳在上海发起创办了《汇报》，竭力鼓吹西学。不久赴美国转往秘鲁，调查当地华工状况。1875年冬被任命为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钦差副公使，次年耶鲁大学为表彰他对中美文化交流的特殊贡献，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留学计划实施后，顽固守旧的官僚士大夫们，无不惊呼此为“亡国之举”，进而群起反对，极尽攻击破坏之能事。在陈兰彬与容闳这两个留学生监督之间也暴露出尖锐的矛盾：容闳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支持学生接受西方文明和思想，而陈兰彬则试图引导学生掌握西方科技知识而不背离封建专制主义轨道。1875年，清政府任命陈兰彬、容闳为驻美正副公使后，先后改派区谔良、容增祥、吴子登为留学生监督。吴子登也认为容闳放纵学生，认为学生即使日后学成归国，也不但无益于国家，且有害于社会，要求解散留学事务所。原本支持留学事业的奕訢由于偏听偏信，担心学生沾染洋习，对大清社稷不利。1881年，他以留美学生“见异思迁”、洋化甚深为由，奏准全部撤回。留美学生事务所撤销后，容闳循例回国销差。留学幼童被迫回国，容闳毕生志愿“横被摧残”^①，对其打击异常沉重。

四 从维新改良到支持革命

1883年容闳返回美国，自以为“与中国政府，已永远脱离关系”。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使始终心系国事的容闳再度关注危难中的祖国。容闳通过旧友蔡锡勇，两度投书湖广总督张之洞，主张向英国借款，购置铁舰，雇佣洋兵，坚持对日作战。不久，张之洞电召容闳回国。年近七旬的容闳，离国12年后再次得到朝廷的召唤，心中感慨不已，准备回国实施其变法自强之法。1895年夏，容闳回到上海，“购中国官场礼服，耗费不貲”。^②当时张之洞由湖广总督调署两江，容闳便直接到南京拜谒。但张之洞只是以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71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73页。

一个江南交涉委员的“挂名差使”敷衍容闳远来之意。稍后实授两江总督的刘坤一也是如此。容闳无奈，随即辞职，并声称从此“与江南政界断绝关系”。^① 容闳得不到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又“拟游说中央政府”。^② 他相继提出了国家银行计划和修筑津镇铁路计划，试图在教育救国失败后再以实业救国。但这些计划由于反对势力的阻挠而化为泡影。容闳大失所望：“予之种种政策，既皆无效。于是予救助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③

救国无门的容闳对洋务派和清政府大失所望，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时，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运动正逐步走向高潮。容闳与维新派频繁来往，积极支持和参加维新运动，正如他自己所说：“予之寓所一时几变为维新党领袖之会议场”^④。戊戌政变后，容闳逃亡上海租界。1900年，他被公举为中国国会的第一任会长，被通缉而避往日本。逃亡途中，在轮船上巧遇孙中山，这是他们两人的初次见面。两人的彻夜长谈使容闳深受启发，开始倾向于革命。这次见面，容闳对孙中山印象很深，认为他怀有大志。而孙中山认为容闳声望素著，富有新思想，是热心于改革救国的老前辈。1903年初，华侨兴中会员谢纘泰等发动反清起义，求容闳臂助，容氏毅然前往美国寻求外援，“方欲进行联络”，却得知起义失败的消息，便留居美国。在美国，他继续从事救国活动。主张联合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康、梁的保皇派，共同推翻清王朝。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康、梁保皇派反对和破坏革命的行径使容闳逐渐觉悟，于是同康、梁决裂。与此同时，容闳更加拥护和支持革命，与孙中山关系愈加密切，认为孙中山是最可信赖的。容闳写信给曾经积极支持康有为的美国军事家荷马·李及财政界人士布思，劝其与康、梁断绝关系，并把他们介绍给孙中山，使这两位美国友人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派。容闳还向孙中山提出了一个“红龙中国”的起义计划，准备募集500万美元、10万支枪和1亿发子弹，为反清武装起义所用。翌年2月，容闳写信给孙中山，告知其实施“红龙中国”计划的具体安排，并约请他与荷马·李及布思会晤，商谈借款事宜。该计划后因美国银行家不肯冒险借款而搁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并取得

①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75页。

②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75页。

③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77页。

④ 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81页。

胜利，80多岁的容闳欢欣鼓舞，他致信全体革命者：“你们代表了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民——那些近三百年来深受压迫和抑制的人民——呼求一个共和国，为解除人民的疾苦，去争取自由和独立。既然现在你们已经把这些满洲人推翻，那么不管那些政治两面派多么能干和花言巧语，也不能引诱你们离开坚定的初衷，即呼唤共和国的到来。”^①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特致函容闳，邀其归国任事：“当此破坏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才才智学，达练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② 1912年4月21日，容闳于美国哈德福特市沙京街寓所逝世，享年84岁。“到中国来，参观参观这个新共和国”的愿望最终成为他未圆的梦。^③

1884年，王韬在李鸿章的默许下回到上海。他在淞北筑“弢园”定居，以著述自娱。他虽更号为“淞北逸民”，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却未曾有须臾忘却。他在《申报》、《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匡正时弊的文章，并不时发表演讲，在知识界产生很大影响。1886年，他应英国传教士傅兰雅等人之邀，出任上海格致书院掌院。他改变了书院的办学宗旨，规定入院就读者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还要讨论时政，关心国事；设置了一套合乎近代教育制度的课程。来自全国10多个省的士子汇集格致书院，这里也成为维新变法思想传播的重要基地。这期间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正起，后起的日本也对中国覬覦已久，面对清政府文恬武嬉、不思变革的现状，王韬忧心忡忡。1894年，王韬经郑观应介绍与孙中山相识，并帮助孙中山润色修改《上李鸿章书》，向李鸿章宣传改良主张。王韬还给李鸿章的一位幕僚写了引荐信。1897年秋，王韬病逝于上海寓所。虽然他并未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没能看到其后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变，历史的脚步还是不可阻挡地迈进了新的时代。

五 近代知识分子的境遇

19世纪60年代，俄国作家彼得·博博雷金提出“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在俄语中，这一概念由智力和天才两个单词组成。而西方学术界一般

① 顾长声：《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79页。

② 刘中国、黄晓东：《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178页。

③ 刘中国、黄晓东：《近代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175页。

认为,知识分子除了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并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还必须具备超越个人及其所属团体的私利之上,深切关怀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利益的品格。我国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士大夫阶层可以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他们以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封建君主专制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社会功用。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新思想的传播、新式学校的建立、出国留学的盛行,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在中国出现。作为近代产物的知识分子,其知识结构、角色认同、价值观念等方面都与传统士大夫大相径庭,摆脱了“学而优则仕”的旧式生活路径,但士大夫的某些传统特质却被近代知识分子继承了下来。王韬、容闳所处的时代,正是近代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透过他们的个人经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代知识分子困惑与无奈的境遇。

(1) 传统观念的危机与中西文化矛盾。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儒学权威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焚毁孔庙及禁止士人读孔子之经,就代表了中国人第一次用西方的观念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施以猛烈的攻击^①。而“王韬可能是现代第一个既受过中国经典训练、又在西方度过一段有意义时光的中国学者”^②。王韬近代思想的形成,反映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的转型,但由于其儒家观念根深蒂固,他的思想很大部分仍是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变通,所以,“王韬依旧自诩为一位儒家”^③。作为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留学生,容闳较早形成了西化的性格和资产阶级意识,使他在立志于西学东渐事业的初始,就不像长期生活在儒家传统文化环境中的早期改良主义者那样,动辄以传统认知去附会理解他们所接触的西学。就中学根底以及向西方展示东方文化风貌而言,容闳确实不具备王韬的素养与实力。这也使容闳与封建卫道者的冲突愈加尖锐,不无全盘西化的倾向。他试图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标准,从根本上改造中国,忽视了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特点,缺乏将中西文化置于时代性和民族性的有机整合的思考,无助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在晚清社会新旧思想杂糅、中西文化交汇的复杂局势下,缺少中学根底的容闳显然无法解释中西文化的矛盾。

①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129~130页。

② [美]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67页。

③ [美] 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98页。

(2) 价值取向的转变。这两位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都曾希望借助太平天国之力实现自己的理想,反映了社会动荡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与矛盾心态。他们一方面摆脱了“忠君事亲”、“代圣贤立言”的人生准则,另一方面依旧将“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最高目标。容闳向洪仁玕提出7条建议是为实现自己的救国抱负。而对于王韬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的举动,美国学者柯文考证,1854年洪仁玕滞留上海期间,与麦都思来往密切,而王韬此时也是麦都思的主要中国助手之一,两人就此相识。而在1860年夏英国伦敦会的艾约瑟、杨格非等传教士访问苏州及次年春艾约瑟的天京之行中,王韬都以助手的身份同行。^① 由于与太平天国上层人物的交往,通过太平天国实现梦想对王韬也充满了诱惑,于是他也选择了向太平天国献计献策。虽然王韬、容闳两人上书太平天国的形式与内涵完全不同,但结果却是一样的:与太平天国失之交臂。对二人来说,是少了一条实现人生理想的蹊径;对太平天国而言,则是又一次错失与知识分子沟通的良机。但从太平天国对知识分子一贯实行的政策来看,这又是必然的。

(3) 知识结构的变化与近代教育、新闻业的发展。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攻击,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中国传统文化学术价值,广泛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点,形成多样化、中西合璧的知识结构。“道光、咸丰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② 多样化的知识结构造成知识分子职业的多样化,其中近代教育事业、新闻事业尤其是他们所热衷的,这也是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共识。王韬对科举之弊有着切肤之痛。“往往有髫龄就学,皓首无成,而士之受之愚者不少矣”,“设以学时文之精神才力,专注于器艺学术,即不能出而献诸大廷,而终有一技之长,一材之擅,足以终身用之而有余者”。^③ 他提出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校,精选各科专门名家为导师,让士子掌握各科知识,培养有实学和技能的科技人才,并在自己主持的格致书院进行了积极的实践。而容闳更因其对中国

①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第33~36页。

② 邵作舟:《邵氏危言》,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第181页。

③ 王韬:《菰园文集外编》,第48页。

近代教育事业的特殊贡献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他们都意识到：新闻媒体的缺乏是导致国家封闭、落后、愚昧的重要方面，西方国家的良好制度与民风与其舆论公开、信息开放、新闻传媒的发达息息相关。王韬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是第一份由中国人创办并取得成功的报纸，政论色彩明显，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同样为开言路，启民智，1874年6月16日，容闳和同乡叶廷眷、唐廷枢、郑观应等在上海创办《汇报》。这份报纸最后虽以流产告终，但毕竟是在上海出版的第一份由中国人创办的报纸，在中国新闻史上同样具有重要地位。

(4) 依附于洋务重臣的无奈。王韬、容闳等人虽然富有改革精神，但由于不是正途出身，社会地位相对较低，必须借助掌握军政大权的当权者的赏识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在晚清这批知识分子中，冯桂芬、郑观应、唐廷枢、伍廷芳、马建忠、薛福成等人都曾在李鸿章等洋务重臣手下协办洋务，或是曾国藩、李鸿章的幕府中人。王韬学识渊博，深通实务，并有强烈的从政感。但他以一介草民，屡次上书当政者，却极少受到青睐，始终未能得到一官半职，只能充当当权者的幕外谋士。尤其是晚年的王韬，对洋务官僚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经济依附，心存高远而又落寞无助，常常表现出文人的豪迈气与穷酸气交织的矛盾性格，甚至以酗酒、嫖妓等行为释放心理压力，反映了传统士绅向新型知识分子蜕变过程中彷徨无奈的心态。容闳始终梦想将平生所学报效祖国，在他的有生之年却始终没有被自己的祖国真正接纳，从教育救国计划的流产到实业救国的失败，是他面临的必然结局。这样的事情并非只发生在这两人身上。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因思想敏锐，见识卓越而深受当时的清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赏识。被李鸿章调到北洋水师学堂后，又由于气质、抱负与同僚们格格不入，而被李鸿章所猜忌，长期不予提拔重用。这种对官僚权臣的依附严重阻滞了他们个人才智的发挥。

结 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王韬、容闳的一生就是一部中国晚清史的缩影。他们经历了晚清史上的诸多重大事件及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全过程。为拯救灾难深重的祖国，他们都曾尝试过各种不同的方法，先后投身于洋

务运动、维新变法，但却始终不能进入统治阶级的决策层。透过他们的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转型时期面临的矛盾与困境，他们的境遇与命运在这一时期的先进知识分子中具有典型意义。

虽然他们的个人经历并不能涵盖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发展轨迹，但他们作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走向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先驱，尽管其西学思想不尽相同，但都未停留在“师夷长技”即学习西方科技这一层面，而是由认同西方器物文化发展到主张仿效其政治制度的更深层面，达到了当时社会的最高水准。尽管他们命运多舛，怀才难遇，人生境遇耐人寻味，但他们始终站在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的前沿，怀着对民族国家的满腔热忱，矢志不渝地投身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大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 南京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